

栗戡时等

# 湖南反正追记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栗戡时等

# 湖南反正追记

同明、志盛、雪云、  
湖南人民出版社

（湖南人民出版社）

栗戡时等  
**湖南反正追记**

同明、志盛、雪云 编

责任编辑：李润英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衡阳印刷厂印刷

198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00,000 印张：9 印数：1—3,700

统一书号：11109·186 定价：0.67元

## 出 版 说 明

湖南在辛亥革命中，是首先响应武昌起义，建立革命政权的省份。湖南省图书馆保管部的几位同志，从馆藏大量关于湖南辛亥史事的资料中，选出一十五种，汇编为本书。现予出版，以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。

本书只收辛亥革命身历目见者的记述，以及革命前夜和辛亥当年的直接报道；凡是根据间接材料纂辑而成者，一概不收。所收材料即使并非全面记载，总可以从某个段落或某一侧面，反映当时政治、社会激烈变动的一些真实情况。同时，采辑只限于当时著录、未刊文稿和罕见的早年印本；凡解放后曾经刊印过（包括内部发行）的资料，除个别重要材料外，即不再收录。

全书可分为四个单元：《湖南反正追记》等三篇是湖南革命的亲历记，字数最多，为全书骨干。《黄克强长沙革命之失败》等五篇，是辛亥前夕湖南革命形势的实录。《湖南光复记》等四篇，为辛亥当年记事。《辛壬春秋》等三篇，则为清政府方面关于湖南事件的文电，以及站在反对革命立场上的人们的记述，是一组反面材料，特附录于后，以供史学工作者参考。《湖南反正追记》既是首篇的篇名，亦即作为本书的书名。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湖南反正追记 .....        | 秉戡时 ( 1 )         |
| 余之辛亥革命日记 .....      | 潘朕凡 ( 29 )        |
| 湘事记 .....           | 子虚子 ( 58 )        |
| 黄克强长沙革命之失败 .....    | 曹亚伯 ( 112 )       |
| 龙黄溪先生遗书(节录) .....   | 龙绂瑞 ( 119 )       |
| 关于浏醴萍之役 .....       | 据旧《醴陵县志》等 ( 127 ) |
| 丙午萍醴起义记 .....       | 陈春生 ( 138 )       |
| 关于长沙“抢米”风潮 .....    | 《东方杂志》 ( 177 )    |
| 湖南光复记 .....         | 湖南模范讲演团 ( 192 )   |
| 《黄汉魂》(节录) .....     | 湖南演说总科 ( 196 )    |
| 辛亥札记 .....          | 居 正 ( 206 )       |
| 辛亥日记 .....          | 凌盛仪 ( 229 )       |
| 〔附录〕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 辛壬春秋—— 湖南第五 .....   | 尚秉和 ( 262 )       |
| 宣统政纪—— 有关湘事摘录 ..... | 金毓黻 ( 269 )       |
| 辛亥殉难记(节录) .....     | 吴庆坻 ( 277 )       |

# 湖南反正追记

栗 戡 时

**弁言** 予性鲁钝，不善作文，又懒甚，不好做文章。故朋友之间，除数句口信外，殆无见予笔墨者；佛家所谓文字障，庶几免焉。近日偶与人谈辛亥湖南反正经过，听者惊异，觉其津津有味，请予纪录成文，以备后贤酒后茶余谈资。予以事体重大，头绪纷繁，口谈则易，笔记则难；且老眼昏花，不能作字，婉辞却之。第四孙翼初在旁，自告奋勇，请予详细说明，代为笔录，完毕，再由予校阅，予笑允之。然当日事情复杂，各自秘密，不相闻问，予所知者，仅一小部分而已。今事隔三十余年，当时纵合之迹，鲜有能言者。盖力行者不愿多言，而贪冒者自以为是的。袁世凯设稽勋局，派人来湘征求事实，在事诸人，无肯执笔。谭都督谓左学谦：尔辈既为之，而不能言之，何以故？左谓功罪未明，是非未定，言之恐增嫌怨。今则时过境迁，特就经历者信口述其大概，使人知我辈无所希冀、爱憎于其间，聊备关心文献者之采择而已。至于触犯忌讳，或与时贤记载冲突与否，均不暇计及。其有记

---

①《湖南反正追记》原刊于一九四八年出版的《湖南文献汇编》第二辑，署名：长沙栗戡时墨庵口授，四孙翼初笔述。栗戡时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，一九一一年十月至一九一三年二月，曾任湖南外交司司长。

忆不清，或名字籍贯遗忘者，均付阙如，阅者见谅。爰于校阅之时，删繁补漏，俾克成篇，亦未分立章节，盖口述之时，无暇次第也。属草既定，乃请当日都督府秘书长吾师黄俊（字黄山，长沙人。）先生鉴订，又请当日同事左学谦、黄翼球两君校阅，谬承多所补正，实所感谢。其他同志，未及遍请校阅，遗漏良多，心甚歉悚。惟叙事但求真实，下笔不敢违心，与雌黄信口欺世盗名者，当然有别。爰弁数言于首以志颠末。

湘人性素好动，尤饶侠气，平时毫无异人之处，一遇压抑，则图抵抗，每以生命为孤注。数人相聚，好谈故实。忆予幼时，闻父老闲谈满人入关杀戮之惨，与对洪承畴之诱降，及金之俊之十不降条件（即男降女不降，生降死不降，儒降而僧道不降，官降而皂隶不降，城市降而乡村不降。）等等，心极赞佩，而恶满人之心，不禁油然而起，然为古人忠君爱国之说所囿，又不敢存反对之心。及读书识字后，阅《扬州十日记》、《嘉定屠城记》等，于是报仇之念，渐不可遏。自甲午中日战争，清军为日本所败，国势日蹙，国人密谋改革。戊戌春，梁启超、皮鹿门、熊希龄等，在长沙设南学会，提倡新学。未几，发生政变，清光绪帝被慈禧太后所囚，酿成庚子拳匪之乱，而有八国联军入京之祸。湘人鉴于亡国灭种之惨祸即在目前，群思起而救国。于是留学日本者颇多，受孙总理之领导，及欧美民主潮流之影响，从事革命者甚众。而国内复得章炳麟（字太炎，浙江余杭人。）、黄兴（字克强，长沙人。）、陈天华（新化人）之宣扬，《黄帝魂》及《警世钟》等书之传播

激励，同盟会之《民报》《复报》，及梁启超所编《清议报》等杂志之鼓吹，社会图谋革命之潮流，乃与日俱盛。

清帝宣统即位，川汉、粤汉铁路借款问题重起，更促进川、鄂、湘人积极从事，实为全国革命之最新导火线。盖粤汉路经粤、鄂两省极短，均不过二、三百华里，独直贯湘境自南至北达九百余里，故湘境路线最长。四省之中，粤省最富，川鄂次之，独湘省最贫。粤人在朝权贵，较三省为多，政府与有默契，遂允粤路民办，粤人无言。而将湘、鄂、川三省铁路，名义上收归国有，实则仍以抵借外债，故三省人民，群起反对。先是庚子拳匪之乱，围攻各国使馆，杀毙德国公使，及日本书记官，而招八国联军入京之辱。辛丑和约成立，除赔偿各国兵费本息银九百万两外，又派遣首相李鸿章（字少荃，安徽合肥人。）赴日本及欧美各国道歉。各国均以普通使节待之，独比利时国王待遇特别优渥，李甚高兴，遂以粤汉铁路建筑权让与比国承修。比因财力关系，向美募款，而建筑权利，遂暗移美人之手。期满，而美亦仅修成粤境三水至佛山支线九十里，其余均未动工，国人遂倡收回自办之议。其后路虽收回，然已付代价银七百余万两。惟是三省财政及社会经济，均不发达；粤虽富庶，然只闻集会筹款，不闻开工，川亦相同。鄂则既须修粤汉，又须修川汉，而川汉工程艰巨，需款尤多，更无动工消息。独最称贫瘠之湘省，因人民之热忧，绅商之努力，不独已修成长沙至株洲一段之一百二十余里，可与萍株支线接轨。且已筹得盐斤加价股，田租累进股，及三佛支线余利等的款，年约五百余万元。

以当年造路价格估计，约须四年乃至五年可成。时清廷邮传部尚书为徐世昌（东海人），嫌其缓慢，其左右遂力主借款

修筑。湘人鉴于昔年美人贷款之覆辙，及金价日涨，借金还金，将来偿还损失必极重大，主张借银还银，以求减少损失。然决不能为金本位国家所认许，于是极力反对借款，认为借款即是卖路，群请湖南谘议局力争。其时谘议局议长为谭延闿（字组庵，茶陵人。）、副议长陈炳煥（字树藩，湘阴人。）及予二人，比由谘议局推陈炳煥、曾继辉（字月川，新化人。）、石秉钧（字公溥，邵阳人。）及予四人进京请愿，与徐世昌及侍郎汪大燮（字伯庚，浙江人。）等接洽停止借款。然口头表示虽甚圆满，结果仅得一油滑之批，湘人大为不满，时宣统二年夏月也。及盛宣怀（字荇生，苏州人。）继任邮传部尚书，渠向以善借外款著名，主张借款尤力。宣统三年夏月，湘谘议局复推议员左学谦（字益斋，长沙人。）、周广询（湘乡人）为代表，再往请愿。适遇四川请愿代表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等，因拒款请愿，被押解回籍。左搭车送之，蒲告以“国内政治，已无可为，政府已彰明较著不要人民了，吾人欲救中国，舍革命无他法，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，望联络各省，共策进行。”周因留京而左返湘，以目击情形，详告同人。于是遂各各暗中增组机关，而谋进行革命愈力。予所知者，有下列各处：

时因粤汉路而起之暗潮极大。湘省士绅以维护主权名义，早已组织湘路协赞会，会址设上太平街贾公祠内，由易宗羲（字佑循，善化人。）及予任驻会干事。

左学谦、黄鏊（字同皆）、黄用楫（字敦之）、阎鸿飞（即阎延年）、阎鸿燾、黄翼球（字湘澄）、常治（字省吾）、曹耀材（字济辉）（均长沙人。）等，借长沙筹备地方自治名义，以长沙自治公所为革命机关。

吴作霖（字仲云，湘潭人。）等欲暗中训练革命党干部人才，组织湖南体育社，其办法以日本振武学校为模范，亦借贾公祠为社址。

罗杰（字峙云，长沙人。）等组织辛亥俱乐部湖南分部，以之暗中策动革命，亦设贾公祠，推王汝楫（澧县人）及予任驻部干事。

文经纬（字晋藩，善化人。）、王犹（字亨五，常宁人。）、吴孔铎（江西人）等，组织富训商业学校，暗中鼓吹革命，吸收党员，租胡家花园民屋为校址。

文斐（字牧希，醴陵人。）、李九（亦名庶黄，衡山人。）、曾杰（字伯欣，新化人。）等于鸡公坡佃赁民屋，组织机关，并制造炸弹。

又有刘大禧（字芝德，长沙人。）设成衣店于北门正街，与陈作新及新军官兵来往，亦暗中鼓吹革命。

陆军小学诸生，皆血气正盛，排满革命思想，与日俱增，栗显扬等暗中联络鼓吹，另成一学生团体机构。盖自戊戌政变以后，湘人革命思想，至遍及学界全体，如明德、修业、广益、唯一等中学及高等学堂、中路师范各校，均以提倡革命著称，以其内容不详，不能叙述。

又有向瑞琮（字厚甫，宁乡人。）时任常备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炮兵管带（清军营长之称）；易堂龄（字致中、湘阴人，时于四十九标任队长）及李金山、易文彬（后改名易克骏）、安定超、姚运钧、喻义（浏阳人）等，均为新军代表，于四十九标、五十标中活动，鼓励新军，参加革命。徐鸿斌等则在巡防队中活动（总计常备军巡防队共代表三十二人）。

当湘人谋革命日亟，革命机关风起云涌之时，忽有川省代

表潘江等三人至。盖蒲殿俊等返川后，即极力策动颠覆清廷，并于六月间遣潘江等分赴湘、鄂、粤各省接洽。据彼等云：

“四川准备已甚充足，以袍哥（约同于湖南之红帮）、棒客（约同于湖南之黑帮）为基础，人数众多，遍布全川，将来举义时，尚求各省协助，以祈早日成功。”（按四川士绅，多通袍入棒，闻当时谘议局副议长罗伦，即与袍哥有密切关系，庞光志少年游戏伙伴，此时均为袍哥、棒客之首领，故易策动之。）

于是湘人遂密谋策动驻省城之新军巡防队，并谋联络会党，方能行事，而苦于皆不同道，无法与之接洽。有陈作新（字振民，长沙人。）者，曾充新军排长，嗜饮酒，以好谈革命被黜，乃在李藩国家教书，藉以安身。黄锬、曹惠（字孟其，长沙人。）识之，乃邀至长沙自治公所与谋。陈力任联络新军之责。又有言留日本铁道学生焦达峰（浏阳人），乃湖南会党之渠魁者，于是文经纬、易宗羲（均善化人）等设法约至贾公祠三楼会晤。焦亦慨然担任联络会党之责，惟以清室铁桶江山，不易破毁，仍主张采庚戌饥变之手段（即烧教堂洋行，捣毁学校等行为。）。文、易力劝其勿扰乱秩序，至于垂涕，焦乃承认，定期召集党徒会议，共策进行。

八月某日，陈作新到长沙自治公所复信，称新军方面均联络成熟。黄、左等以事体重大，若仅恃陈一人接洽，未能坚信，乃托陈直接间接转知新军士兵，派代表出席会议，同时接头，以便互相认识，利于进行。又因人众，碍人眼目，苦无会议地点，欲于乘人不防之中，以紫荆街福寿楼茶馆生意冷淡，乃假其楼上集会。共到四十余人，衣服品类，至不齐一，由黄锬、左学谦、焦达峰、吴作霖等接谈片刻，焦之言动，俨以首领自居。忽闻为政府密探侦悉，乃匆匆散去，或云茶馆主人即

暗探之一，故是日极为危险。后又改在岳麓山屈子祠集议，以为该处偏僻，可无妨碍，亦被密探侦知而散。于是由吴作霖等商议，约定三更时，选定义冢山丛葬处开会，军界代表于发寝号后越墙子赴会，始告圆满。当会议时，巡防队代表，以杀其统领黄忠浩（字泽生，黔阳人。）为交换条件，<sup>1</sup>否则巡防队不加入。左、吴等以黄知兵事，平日声望甚好，原拟推为湖南都督，及闻巡防队代表之条件，心虽不欲，亦不得不勉予承认。

先是焦达峰、吴作霖等，拟乘十月初十清西太后生日万寿之期（其时慈禧去世数年，早废庆祝，并此不知，粗卤可笑。），由焦命其徒众，以看万寿为名，暗集省城，以免张扬，而避侦探耳目，然后相机起事，较易成功。及八月十九日，武汉起义，事机日迫，群谋提前举事，俾为后援。湘抚余诚格（字寿丞，江浙人。）手绾全省兵权，而认新军有革命嫌疑，拟将新军调至各县，分散驻扎，则力小而易制服，势散而难联络；又认巡防队均年老持重之人，反对革命之心理必深，再以老成人率之，必容易就范，遂委黄忠浩为右路巡防队统领，使加扩充，驻守长沙，倚为长城。党人致函黄忠浩，请其率兵反正，数日之间，约七、八百件，黄不为动。及八月底，常备新军之在省区者，仅一营有奇，且受九月初一日开往株洲之命，其余皆早调往他处矣。

武昌起义之后，余抚命刘玉堂率队援鄂。刘至，以所部归顺革命军。后刘在鄂战死，时人惜之。

其时谣言既盛，群思革命，苦无机会。二十五混成协马队营之革命党，欲借失火时，群众往救，当有军队弹压，俟火灭，群众退入城中时，即以兵随其后，长沙可望袖手而得。乃于八月二十七夜，于营内马草上自行纵火。俄而群众推救火

机，担水桶而至，不见军队。乃自闭营门，谢绝群众，声称恐革命党混入其中，难分皂白为解，而自行扑灭。

外面忽传抚署大堂已陈列机关枪炮，拟与革命党决战。于是人心惶惶，公请谘议局设法，请其撤去，以免长沙毁灭等语。谭议长等不得已，同议员及副议长数人往晤余抚。余言：“外面谣言，切不可信；适来诸君见大堂上有机枪炮否？等一会诸君还可过细查看，甚望以目睹实在情形转告湘中父老，不要轻听谣言，自相惊扰。”

吴作霖因党人力量薄弱，饷械缺乏，而政府方面，则饷械充足，各处军队林立，一旦举事失败，深恐革命未成，而湘省先成齑粉，负罪实深，辗转思维，彻夜不寐，欲求一避免流血之法，只有恐吓、劝诱，同时并用。乃于八月三十日晨，到湖南谘议局。号房刚起床，吴厉声问议长来否？答以未来。又问副议长来否？又答未来。吴大怒，因大骂曰：“我是革命党人，不怕死的，我姓名叫吴作霖，我手下已来三千多人，分驻满城旅馆商店等处，除各有炸弹、短刀外，人备火柴一合。将来举事，只要各将火柴刮燃，就可将长沙全城烧为平地。他们这班议员，号称人民代表，现已死到眉毛颠，这时还不到局，要他们干什么！”忿忿而去。及谭议长接电话驰至，则已不知去向。遣人遍觅，毫无踪迹。盖吴已到长沙自治公所，与同志诸人共商，遂定于当日午后四时，放火为号，同时举义。

当时予虽辞湖南谘议局副议长，然社会上之资格信用尚在，又无何种不法行为之显著事实，湘政府虽认为有革命之重大嫌疑，然处置为难。欲以利禄笼络，而为调虎离山之计，乃托予师曹籽谷先生先容（名典球，长沙人。）委予视察三路学务。予以任务在身，无论何等穷困，义不与政府合作，尤恐遭

其暗算，如禹之谟在靖州被难故事，不允。又拟赠予以巨款，俾游西湖，予亦拒之。及武汉起义，予思昔在日本肄习法政时，闻中村进午博士讲授国际公法，而知红十字会之起源，及所处中立地位，因思此次革命战争，为时必久，伤亡必重；在清军方面，人力、财力、物力，均易凑办，而革命党方面，一无所有，将来病伤兵士，断手折足，纵哀呼惨厉，谁与诊救者？一时悲从中来，即思组织红十字会，以资救济，亦吾侪提倡人道主义之一途，且为救护病伤同志必不可缺乏之要举。然办理红十字会，必须得交战双方之允许。在革命军方面，立案不成问题。而在清政府方面，必须立案，得其承认，方能依据国际公法，享中立权利，会中执事，乃有保障。予以有革命嫌疑之人，办理红十字会，请求湘政府立案，必难邀准。乃与梁宗实（字以行，长沙人。）、梁家驷（字荫湘，长沙人，均瑞威国信义会教友。）商议，联络瑞威国信义会福音堂牧师陶思德、医士尼尔生与之密商。因福音堂素称慈善，先由予等致函于彼，彼遂转函英领事翟比南（时瑞威国在长沙领事职务，由英国领事代理。），再由翟比南函湖南政府立案。而翟性素强横，颇为政府所畏惮，可望准案。予又假教育会开发起会，谭议长亦到会，见予即笑谓曰：“墨生，你又在这里骑墙吗？”予答曰：

“并非我想骑墙，实因此会关系重大，无人办理。将来对于病伤同志，毫无救济办法，心何以安？”谭曰：“你这话道理是不错的，虽然……”自此以后，予即以筹办红十字会名义，到处拜会，兼探消息。湘政府尚未函复英领事，而长沙反正矣。当日尼尔生语予，谓英领事命令，长沙如有危险，则领事馆挂红旗，遇有重大危险，则悬黑球；凡遇悬黑球时，侨民必须渡河歇宿云。而予等与尼、陶会商，虽悬黑球，渠等均未渡河，

亦可见西人热心慈善之一斑矣。反正后，梁宗实即以个人名义封东茅巷仕学馆房屋为湖南红十字会会址（建国三年又就其原址改红十字会为仁术医院），同时雅礼医院医生颜福庆（江苏人）、胡美（美国人）两博士，循道会之牧师任修本（英国人），内地会之牧师德慕敦（德国人），又某教会之牧师吴立德等，均自动集合，与予等合办湖南红十字会。予又请求湖南军政府筹拨巨款资助，于是一切人力、财力、物力之困难问题，均皆圆满解决矣。

先是武昌起事时，川人庞光志（字叔向，四川兴文人。）、蓝琮（字铁生）奉黎大都督命令来湘联络。庞往访二十五混成协协统萧良臣，劝之响应。萧告以新军皆调赴各县，我系外籍人士，无能为力，此事宜与本地士绅联络或有办法。庞以绅士应以谘议局为总汇，乃往访谭议长等，亦不得要领。后与左学谦、吴作霖等相会，始深谈，因议湘省推阎鸿飞赴鄂请兵运械，以便乘机起事。其时，鄂实无兵可派，而湘已由黄陂、左学谦、吴作霖等会合各同志，召集新旧两军开紧急会议，隐奉焦达峰、陈作新为临时指挥，定期举事矣。

当日党人准备，实未充足，且距原拟之期甚远。因湖北事急，一再改期，以求提前举事，以为之助，免失时机，并计划用军队外攻，会党内应，俾出政府意外。嗣据焦达峰预计，会党诸人，必须九月初二日方能到达，遂订于九月初二日举义。及三十日清晨，吴作霖在谘议局大发狂言后，深恐激生意外事变，遂订于即日午后四时举义，推陈作新发布命令，四城放火为号，同时新军入城。届时陈方大醉，不能发布命令，遂改于次日清晨发动，乃推黄翼球出找陈作新洽商。黄至陈宅（在玉皇殿侧合源桥），随同徐鸿斌及徐友杨玉生四人，同至府正街

留名阁酒店，烹蟹沽酒，密告提前日期（即定妥九月初一日）。杨玉生（系二十五混成协部正兵）取出协统萧良臣命彼侦缉革命党人之密令，交在座同志公阅，翼球谓杨曰：汝欲何为？杨答：我倾心协助诸公，特以表示归诚之意。翼球即将萧密令撕毁。此时陈、徐酒均过量，翼球劝曰：“多事时应少饮。”又托徐鸿斌（巡防营兵目）至巡抚部院卫队部（即抚台衙门与营对照）劝卫队士兵协助，徐慨允诺，始出酒店，分途转知更定之期。是日傍晚，再集会于水风井胡家花园富训学堂，到会者有黄锬、左学谦、焦达峰、陈作新、黄用楫、易宗羲、文经纬、吴作霖、常治、黄翼球等，洽商率引军人入城方面，议决推定陈作新次晨引兵入城，并命翼球即时送作新出城布署，再推定黄锬次晨到富训学堂放火，推易宗羲到贾公祠放火，以为号召。

是日傍晚，新军代表姚运钧（字紫云，后任团长，癸丑二次独立之后，被汤芑铭部下所杀）至水陆洲与驻扎当地之巡防队联络，被捕，捆送新军办理。新军标统某（后任师长），询以往巡防队何事？姚直以接洽革命相告。标统微笑，姚以笑则意恶，自知命危，潸然泪下。俄命闭诸暗室，拟于次日请令杀之。

晚饭后，予方在贾公祠楼上沐浴，忽闻楼下革履声纷然，见号房汗流被面，急奔而至云：“现在来了若干军队，询问某某在否，我均答以不在，后询问你老，答以在；我问有甚么事？他说特来保护的，他们是扎在大西门城上甘大人的军队。”予甚泰然，告以：“既系来保护的，你拿我的名片去，给甘大人道谢，说我明日即来拜访。”号房如予言，军队即去。翌日（九月初一日）清晨，新军士兵四处传达命令，即时起义。其至贾

祠者，眼见放火，匆匆而去，并携来之防身军器，亦忘记携走。其时城外新军，自动整队，长官自楼上见之，问：“你们整队，是谁的命令？”齐声答曰：“我们自家整队，要实行革命。”又问：“何人带队？”答以：“长官若来，则由长官带队；长官若不来，我们自有人带队。”长官知已兵变，缩首而入。乃推队长易堂龄（湘阴人）及另一人率之，分向小吴门及北门出发。其时，姚运钧亦为其同事释放，授以枪枝，则两手拘挛，丧失知觉，乃挟枪于胁，跛行从去。

当新军集合时，原议城中数处放火，以为信号。惟党人举动，均极秘密，雇工均不知情；故贾公祠之火，则由予所用工人郭冬生见室中起火，极力扑灭；富训学校，则由工人受命买洋油，因大西门油店价廉，遂趋大西门购买，以路程较远，比反，新军已入城，故两处均未被焚；而北城外某姓民房独被焚烧，事定后，由军政府赔其损失。

易堂龄所率攻北门一部之新军，因恐驻扎城上之巡防队或有变动，而加射击，乃趋越护城河古云阳门（早已封闭，反正后，改为兴汉门）下，沿城脚西行。城上守兵见之，拍手欢呼曰：“同志快来！”新军闻之，愈放胆前进，及至北门，城亦未关，遂趋军装局。时新军身上，每人仅有枪弹一排（计五颗），猝见大批枪弹，如获至宝，各各尽量饱装；又见拨壳枪枝，知是利器，而未谙用法，则坏其壳而取其枪。带队者因不知攻小吴门一支军队入城与否，倘未能入城，深恐入城人数单薄，设被清政府军包围，则立可歼灭，急整队驰援。迨至水风井，已见攻小吴门军队在街上行走，始放心焉。

攻小吴门一支新军，途遇焦达峰，焦遂加入；至城下，则门已关闭，乃将所获之炮，撤退数十丈，示将开炮攻城。附近